

坚持实事求是作风， 狠狠批判唯心主义

——和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
党校参观组的谈话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

去年刮了一阵“共产风”，在理论工作上也刮了一阵反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有人说，“实践就是理论，读书就是教条”。反对厚古薄今，连马恩列斯的著作也成“古”了。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被人说成厚古薄今。去年某地有一个同志偷偷地读《资本论》，怕人说他厚古薄今，就在《资本论》上放一本《红旗》，把《资本论》盖住。^①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读书就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吗？我看靠不住。如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作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可是在去年，弄虚作假几乎成了“流行病”。河南的西平县某公社胡吹“小麦亩产7320斤”，有个科学刊物叫做

^① 某个市的市委党校，“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派了一个干部到哲学研究所（那时我已从高级党校调到哲学研究所），以“法官”的身份审问我。他说，“你教我们经济学教研室的讲师们读读《资本论》，你是犯了滔天大罪。”我听了，真的大吃了一惊，心想，这家伙是从台湾来的吧！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一九五八年第四期上登了一篇题为《揭开了7320之谜》的文章，作者是陈炎理，好象是某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由”，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的。我看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掩盖7320的谎言”，才比较切合实际。科学刊物发表这样的文章，到底科学不科学呢？还有这样一个生产队，为了虚报丰产，放假卫星，就把几十亩水稻移栽在一亩专供参观用的水田里。白天晒死了，夜间再移栽新的。象这样的卫星还是以不放为好。某地的三关庙乡，被称为“哲学之乡”，他们在大办钢铁时提出的口号是“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这个在近几年内要实现“三超”的思想基础，到底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

列宁说过，离开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甚至是反动的。有些人把列宁的这些话忘记了。个别同志甚至拿着唯心主义当宝贝，说什么“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等等。现在应当好好地检查一下，到底是虚报能鼓足群众干劲呢？还是实报能鼓足群众干劲呢？虚报的结果搞得没饭吃，搞得群众脸都浮肿了，这叫群众脸上有光吗？在过去战争期间，我们的战报，打死一个敌人就报一个，缴获几条枪就说几条枪。如打死一个敌人报打死一百个，敌人是知道的，被骗的还是自己人。所以，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战报是惊人的准确。去年这一阵“浮夸风”，把我们党多年来培养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冲垮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这比丢在地里的粮食损失还大得多。

钢铁、粮食都是硬东西，说假话办不到。钢是一吨一吨炼出来的，粮食是一颗一颗长出来的。孙悟空拔根毫毛一吹，要啥有啥，这本领已经失传了，没地方学。现在我们要的是真铁、真钢，不是

要假“钢铁卫星”。社会主义不是靠吹牛得来的，而是靠一点一点用劳动建设起来的。不能虚报的受奖，说实话的插“黑旗”，要是这样的话，我看这种“黑旗”比弄虚作假的“红旗”还好得多。从旧社会出来的人，在思想、道德方面带有很多旧的痕迹，说假话就是旧社会带来的恶劣作风。如有个公社，就象演戏一样：“报！大事不好！”“何事惊慌？”“流动红旗被夺走了。”“不好了！”于是赶快弄虚作假，谎报成绩。社员想不通，就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教育。无怪有的群众说：“社会主义教育就受不起了，共产主义教育更不知怎样。”党校现在的任务更重了，要培养实事求是的作风，要狠狠批判唯心主义的思想 and 行为。不把唯心主义批透，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刮起这种风来。

恩格斯说：“在形而上学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是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他们的说法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131页）我们的形而上学也不少。“薄古”，薄到不能读《资本论》，“厚今”，厚到要学小孩子的哲学。有个县组织了万把人的哲学讲师团，开始我听说最小的哲学讲师只有六岁，就感觉到这孩子真是天才，以后又听说还有个五岁的孩子当哲学讲师。还有什么哲学秧歌、哲学快板、哲学相声，稀奇古怪的事这样多。

有些人把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学毛主席的著作对立起来，认为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就是“轻视毛主席的著作”，就是“厚古薄今”。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论》对立起来，甚至规定讲哲学只准讲《实践论》、《矛盾论》，多讲一点也不行。

不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两论”也很难理解得透彻深刻，可是对这一套作法不能反对，一反对就要给扣上“轻视主席著作”的帽子。

有些人的数字观念，好象是越大越好，搞密植是越密越好，定指标是越高越好。有一个生产队种了一块麦田，指标是亩产一百二十万斤，其措施：一是密植；二是施特殊肥料——狗肉汤。他们打死了七十多条狗，煮成狗肉汤浇到地里。由于下种过多，出苗太密，长不成，就割掉四分之三，留下四分之一。我以为留下四分之一还可以收三十万斤。谁知道没有过几天，他们把那四分之一也割了。社员在割的时候，一面割，一面故意哭丧着脸，讽刺干部说：“哎呀！我的狗哇！”

还有人人写诗，口号是“超杜甫”。有个工人把机器开动后，到一边写诗去了，结果出了事故，工厂着火了，损失了七十万元，这诗真值钱，真是“超杜甫”了。听说部队有个团，提的口号是人人写诗，争取当“万首团”。于是营也提出当“万首营”，连也争取当“万首连”，排也争取当“万首排”，班也争取当“万首班”，人也争取当“万首人”，还说要争取超额完成任务。有个战士写了一天一夜，写的站不起来，要人从两边架着才能站起来。

“速成风”其实就是“浮夸风”的另一种形式，去年也刮得很厉害。“三天扫除文盲”。为了应付检查，只好把一些知识分子借去充数。有个地方设了一个火箭师范学校，据说“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七天学完全部数学”，“十天学完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这一年真是天才丰收年！还有人主张，“高级党校最好是七天一期，最多半个月”。真要照此办理，西藏的学员未到北京就该回去了。

“共产风”，事实上是反共产主义风。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共产风”，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要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作到人人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能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依据条件，可是去年则大批“条件论”。按照他们的说法，干什么事都可以不讲条件。建设共产主义也可以不讲条件。还有人在那里宣传什么“破条件，创造规律”。我劝这些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啦，不能再这样作孽了！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财产所有权，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22页）。马克思又说：“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来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同上书，第24页）这就是说共产主义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却从来没有说过要消灭人们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因为只占有生活资料是不可能变为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的。我们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现在对西藏没有参加叛乱的奴隶主和农奴主也实行赎买政策。这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剥夺他们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当地主、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已经被剥夺后，还要刮“共产风”，那实际上是剥夺劳动者占有的生活资料，去年不是什么都要归公吗。

建议同志们把《哥达纲领批判》很好地读一读，马克思在这本书里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这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新社会中的“旧社会痕迹”。在封建社会里，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不平等，所以资产阶级要求平等、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它得到了平等，但无产阶级还受压迫，因此，无产阶级要平等，要革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剥夺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从形式上看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并不平等。因为一个劳动者和另一个劳动者，在付出同等劳动，取得同等工资的条件下，由于他们的家庭负担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各不相同了。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的，消灭这种不平等，不能依靠道德化的说教，也不能靠行政命令。谁要想只靠这些力量去改变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分配方式，其结果必然是破坏生产力。去年刮“共产风”的结果，不是弄得粮食丢在地里收不回来吗。

共产党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并不是我们的最后目的。但是，这需要有比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才可以作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目前搞什么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为要认真批判空想的共产主义，必须把去年的“共产风”扫荡一下，不破不立嘛。

党校教研室的同志要认真地学习哲学，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应该很好地读，把它摸熟，把根基打好，这样就能经得

起风吹浪打。去年刮“共产风”的时候，不是有几个自认的或公认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共产风”不仅辨不清风向，拦不住风势，而且还要逞风施威，火上加油吗？当然，看风使舵，投机取巧分子可以不去说他们，对于这样的人，哲学不过是他们为达到这样或那样的卑鄙目的的敲门砖。这种人要是不从根本立场上转变，一辈子也不会懂得什么叫辩证唯物主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现在要强调讲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要特别注意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解决干部的群众观点问题。现在有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就好象奴隶主对奴隶的关系，一声号令下，群众的一切生产活动都要停下来，去服从他们的瞎指挥。谁要不服从，就把他送去“劳改”，简直是敌我不分。这种人根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可以有各种形式，但归根到底是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同志式的互助关系。

要让干部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干部不敢讲真心话的风气不好。弄成这个样子有它的原因。过去在蒋介石统治下闹革命，杀头也要讲，就是被蒋介石杀了，还是革命的嘛！现在谁要向领导人提意见，就有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危险。革命干部为革命提点意见，而背上反革命的罪名，死了也于心不甘，谁还愿意再去向领导提意见？

讲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批判这种现象，使干部的头脑清醒起来。

什么叫党性？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党性。”组织观念强只是党性的一个方面。毛主席说：“主观主义就是没有党性”，主观主义是不自觉的，情有可原。“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几句话见于《聊斋·考城隍》篇里。去年有些人是有心

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党性？这样的人，不克服说谎话的行为，就是念上一百本马克思的书，也掌握不了辩证唯物主义。讲唯物主义要和党性联系起来。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讲这些话一定要得罪人，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又不能不讲话。要是有人觉得我说的过头了，那就请同志们想想，对于某些至今还拿着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当宝贝的同志，你除去向他大喝一声，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后 记

关于这篇谈话记录的一点说明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惯例，每年七月二十日开始放假（四十天），九月一日开学。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新学员已经开始陆续到校了。当天深夜，忽然接到（中宣部）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现在是大跃进的形势，高级党校不开课了，应入学的干部留在原工作岗位，在实践中学习大跃进。已经到校的，动员他们返回原单位。各教研室的教学干部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分别下放到城市工厂和农村社队，参加大跃进，在实践中学习。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只好照办。各教研室都已安置好了，剩下哲

学教研室的干部还未确定下放到何处为宜。当时有一个省，据报纸报道，样样工作都好的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即全省平均亩产小麦一千斤。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好不热闹。我也有点眼热，于是建议，哲学教研室的干部就下放到这个“先进”省去学习。是年九月，哲学教研室的同志们由艾思奇同志率领，到达该省，省委组织部门把他们分别安置在四个县的社队参加劳动和学习。

一九五九年一月，我带了几个干部到该省，想去看看我们下放干部在那里工作学习的情况。到了该省后，在省委招待所住了几天，那时省党代表大会刚开过，省委把他们代表大会的简报和代表们的发言送了我一全份。我已经通知我们下放在四个县的干部集中在一个县，以便听取他们的汇报。省委送给我的那一大堆文件，放在最上面的一份，就是我第二天要去的那个县的县委书记的代表大会发言记录。我高兴地立即取下阅读了一遍。其中有这样一些精彩的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如此等等，一连串总有七、八个不虚报就不能如何如何，结论当然是，要搞大跃进，必须虚报。当时看了，心中纳闷，不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天，我要去我们下放干部集中的那个县，省委派了一个干部送我。我到了那个县，就召集下放干部开会，汇报他们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我们的那些干部都是作了多年地方工作的，富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去时，他们已在当地学习了四个多月，把当地情况已经摸的很清楚了。开会时，省委送我的干部也在座。我们的干部发言情绪很低，说些无足轻重，不关痛痒的话。我还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可是到了深夜，我们的干部来找我，反映了他们几个月来

所看到的真实情况。他们所看到的，和报纸上所宣传的，完全是两回事。举例说吧。在一个县的城关公社工作的两个同志反映，他们所在的公社，社员已经没有粮食吃了。报了千斤省的地方，怎么刚秋收后不久，就没有饭吃了？他们所在的县，还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位下放干部参加该县县委工作，当县委书记。我说，你们把情况报告给那位书记嘛。他们说，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也没有办法。他叫老百姓把红薯藤晒干，磨成面，做糊糊喝，聊以充饥。这就是大跃进年代号称全国第一的千斤省的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其他同志也向我反映了许许多多他们所亲眼看到的浮夸虚报，弄虚作假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我听了大为吃惊，真是感到哭笑不得。我自己的党性不强，为照顾关系，我告诉我们的下放干部，开会时不要公开议论这些事情。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清晨，高级党校的党委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河南省委党校有个参观团，还有抚顺市委党校校长来访问我们，问派谁接见。我说我接见。这里发表的是河南省委党校关于我的谈话记录稿。我接见他们，只是想同他们谈谈，我们办党校，应当给在校学习的干部多讲一些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道理。在谈话时，把我在某省所看到听到的弄虚作假的事即席谈了一些，想用此引以为戒。没有想到他们回去后把我的谈话整理打印出来，到处散发，还给我寄了一份。我一接到此打印稿，就感到要惹祸了。果然有几处得到此件，都向康生告发了。这个理论恶霸立即布置高级党校党委会对我开展批判斗争，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六〇年七月，整整连续整了我八、九个月，最后只得写了《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书，才由他批准停止批判。在斗争我时，总的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到了一九六四年批判“合二而一”时，又把这个

问题翻出来，升级提价，作结论时，定了十大罪状。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在十大罪状的基础上加码拔高，帽子就更多了。在监狱时，有时我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自己回答说，“我犯的是我没有犯过的罪”。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同志大概都是“犯”的这样的“罪”。

一九五九年是我闯祸的一年。还有一个所谓“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的问题。一九五九年夏天，中央宣传部办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学习班，在学习班学习的有好多熟人，一个星期天，他们相约到高级党校去看我们。这一年我们的机关生产搞的不错，蔬菜瓜果获得丰收，留他们在我们的食堂共进午饭。饭前大家在一块随便谈天，在闲谈中自然而然地就扯到各地弄虚作假，刮“共产风”的一些轶闻轶事。当时我也凑热闹地说了一句：“有的地方，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我只是抽象地这样说说，没有谈具体事实。其实，我这样说是有事实在根据的。中央经委会有个内部刊物叫做《经济消息》，有一期上登了一则消息，说某省制订当年钢铁生产计划，原订钢生产额为五百万吨，钢材为二百万吨。不知道制订计划的人怎么忽然一下子聪明起来了，感到这个计划实现不了，于是又从事削减，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削减，最后定为钢五万吨，钢材二万吨。据报道，制订计划的人还说，这个任务是否能完成，还很难说。当时看了这条消息，心想，我们天天在提倡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可是某省领导钢铁生产的部长们，对于本省生产钢铁钢材的设备究竟有多大，难道竟那样心中无数吗？怎么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竟然荒唐到这样程度？当时还只是这样想了一下，还没有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些概念联系起来。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高级党校要恢复开课了，下放在各地的教学

干部和行政工作干部都要调回学校。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的四、五月间,上述的下放干部返校时,路过省委机关,向省委辞行,省委第一把手亲自接见了他们。省委第一把手非常谦虚,要我们的下放干部对他们的工作提些意见。并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他们回校后,向我述说省委领导第一把手接见他们的情况和谈话。当听到第一把手说他们的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的时候,我的“灵机”一动,茅塞顿开,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笑着说道,他太谦虚了。不是只多了一点儿。他们的浪漫主义可以用百分比算出来,他们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不意这话又闯下了大祸。不知道这话怎样又被康生知道了,他又报告了中央,说这话是说中央的,甚至说是反对毛主席的。这样一来,我的“罪恶”就更大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关在监狱整整八年,从监狱放出来,又被流放到陕西三年半。闯祸的总根子就是这里记录的一次谈话,这个谈话记录也只是为大跃进年代的一些奇闻奇事留下了一点微弱的痕迹而已。这次发表时,在原记录稿的基础上,把文字略加整理了一下。

一九八〇年四月三十日